

丽娃河畔的老先生们

郑宗圭

来学校，路上红绿灯多。我曾邀请我们同学去家里玩，见面又是握手拥抱，又是煮咖啡，非常热情。她先生李珩是天文学家，时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台长。

上世界文学课的老师大名费明君，宁波人，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课也上得极好。据当年历史系同届隔壁班同学叶书宗回忆：费老师当时大约四十来岁，戴一副黑框眼镜，衣着整洁、潇洒，风度翩翩，更兼博学多才，长于辞令，讲课极受学生欢迎。费老师擅长讲俄罗斯、苏联文学，介绍普希金、果戈理、A.托尔斯泰等世界级文豪时，不看讲稿，信手拈来，滔滔不绝；讲得起劲时，眉飞色舞。（见《人·时代·社会：一名历史研究者的人生故事》，上海三联书店，2018）很多同学、包括我在内，都听得如醉如痴。

费老师教了我们一年后，被打成“胡风集团”骨干分子。1973年2月11日费老师病逝于青海劳改农场。令人唏嘘的是，费先生是知名的翻译家、大教授，他的七个子女却都是“文盲”。

王养冲是我国的西方思想史泰斗，101岁时去世。早年曾担任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先生的私人秘书，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旅居法国十年之久，师从哲学家瓦耳、历史学家费弗尔、社会学家拉洛等名家，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功底。1947年回国后，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西方社会学思想史教授。1952年转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世界近现代史和西方思想史教授。我们接触到的王老师四十多岁五十不到，正是学者精力最充沛的时期。

束世激先生是我内人的舅公柳诒徵先生的学生，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据说王伯沆、柳翼谋二先生的史才、史识与史德对他影响颇大，从而确立了研究中国古史的志向。他学贯中西，表达能力却一般，上课黑板板书比较多，印象中有点口吃。当时他和戴家祥老师的课，考试分口试和笔试（当时学习苏联，五分记分）。考试时学生到一个小房间摸签抽题目，准备几分钟后去见老师。先由学生根据题意阐述内容，再由老师提问。束先生对我的回答比较满意，我的口试成绩获满分。

心理学老师叫左任侠。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左老师有一次布置回家作业，发给大家一人一张白纸，让大家回去画一幅画，要求画“地球上没有见过的东西”。同学们的作业五花八门，有画冬瓜的一截身体，猪头龙首，老鼠尾巴，反正大家东拼西凑了各式模糊的物件，乱七八糟的。他在第二节课上点评说，你们画的这些物件都是地球上有的，平常见过的。大家说其他的画不出来，他说这个就叫“存在决定意识”，由是引出了一个教学名词。左任侠老师生活简朴，我后来读到一篇回忆文章，提到左老师每年冬天，总是穿着一件褪尽颜色的老棉袄，又板又硬，于是在老先生八十大寿时，发展心理研究室的教师和研究生特别为他做了一件新棉袄，作为生日礼物。

我是温州平阳人，所以对系里两位温州籍老师印象尤深。一位是教古代史的戴家祥老师。戴老师素朴典雅，一袭布衣长衫，腋下夹一布包，站上讲台，不慌不忙打开布包，拿出讲义资料，开始上课。他是王国维入室弟子，专攻古文字学，课上得极好，典型民国教授风范。记得他时常批评郭沫若，说他“不识字”的，“不懂甲骨文”；也批评苏联专家，认为这些人没有“真学问”。当时提倡“学苏仿苏”，学校里几个苏联专家风头足亦傲慢，戴师批评他们却毫不留情面。他有一句名言：“我们之所服膺者，在于科学，不科学的，就要否定；有待补充证实的，就要当仁不让。”

苏洲雷老师由政府机关出来，字好诗好教学好，他的课广受学生欢迎。戴老师和苏老师是同乡同事，奇怪的是，我印象中两人无甚交往，戴老师在我们面前没有提过苏老师，和苏老师交流时也没有提到过戴老师。我和苏老师的课外之缘，是一起参加柳诒徵先生的追悼会。苏洲雷老师为我书写挽联，他和柳先生亦师亦友，诗词唱和，相交甚深。

值得一提的还有，我们进校那一年，华师大接教育部通知，将外文系改为俄语系，撤销了英文组。我高中时英文较好，但从初中断英文学习，从零开始改学俄语，我把这引为终身憾事。

我们58届历史系四个班，120名同学，我们班32人。班上应届生为主，调干生十来人（我是其中之一），年龄差达十多岁，年龄最大的同学叫龚锡孙。龚大姐是抗美援朝志愿军退伍干部，入学时已经三十好几了。马洪林同学算小的，年方19岁。作为调干生，我以28岁“高龄”进入华师大历史系，不意日月如梭，转眼已有70年！回想当年，华东师范大学那批老先生学术醇正，教风朴实，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船公司在黄浦江边上的烂泥地上挖了一个船坞，用来修船，瑞裕船厂就此开张。德国战败后，这个船坞就易手给了英商。后来成为上海船舶修造厂，我小时候听说过这个名字，是因为父母先后到这个厂去劳动过。夏天时船厂高温，父亲回家时肩膀和手臂上都是通红的，而母亲有时回家来，要直接躺在走廊上的水泥地上休息一下，然后才去厕所吐，她说自己中暑了。

等我自己看到这个船坞，已是拍摄《巡江记》的2021年了。从毛麻仓库外面的回廊望过去，船坞那边正在修整，听说有条古船要运过来，是从横沙岛那里的海底找到的，它很可能是从上海出发前往海外的商船。

我终于走到船坞里去，已是2024年早春。那时候，船坞上已经造好了顶棚，古船已被海底淤泥团团封住，安坐在船坞底部，顶棚的注水系统每天定时喷洒纯水，维持古船在海底的环境，等待考古准备完成后，开船探宝。

然后，这个船坞和古船就会建造成古船博物馆，开放给公众。

这大概是我探访过的，与黄浦江航运的历史最相关的公共博物馆了。封住古船体的是湿滑的深灰色烂泥，覆盖在裸露木船舷上的，是密密麻麻的寄生物，贝壳、藤壶和小牡蛎，它们在深不见光的水下生长附着，外壳都是白色的。如今就是死了，肉体化没了，外壳还是牢牢吸附在船舷的木板上，不肯脱落。



一粒草籽

陈丹燕

封在烂泥里的，除了古船和船上的货物，以及船员，还有船蛆。船蛆生活在木船的木头里，在坚硬的船木里不停地钻洞。它的寿命短，却繁殖力强，一代代的，就以在沉船的木头里钻洞为使命，从不懈怠。子子孙孙在水波里繁殖，找到水下的木头就进去打洞。而且分属细致，一种蛆是专门钻穿木板的，另一种是专吃掉木头的，还有一种也是，却因为长相不同，而叫了另一种名字。它们中的某一代应该也被封进了烂泥里，在古船里寿终正寝。我相信它们都是白色的，因为总是见不到光。从未想到它们像人一样有高高矮矮，高个子竟有1米8，比大多数江南的蟒蛇都长。我怕它。

除了大白条的船蛆，还有一种灰白色的蛀木水虱，它长得小，才2毫米，长得像蝉，肚子上长出许多细腿，带着个细小钩子，一副比蝉还恶毒的样子。还没见识到沉船里到底埋着什么宝贝，就先谈论了里面到底有什么虫活着。这就是我们在烂泥上一步一步

左图：船板上附着的贝壳。陈丹燕摄于挖掘现场。

左下：覆盖着沉船的泥上长出的小野草，经过植物园工程师的鉴定，是古老的江南野草，学名：井栏边草。

下图：小野草被移送到辰山植物园培育，现在已经长得快40公分了。



技术与大众传媒

南帆

大约数十年左右的时间，互联网技术进入耀眼的爆发期，众多突破此起彼伏，并且相互震荡。一些技术的运用限于特殊领域，例如医学的远程手术与诊断，金融的全球结算系统，或者军事领域的无人机与精确制导导弹；另一些技术大规模渗入日常生活，几乎涉及所有的人，例如通讯工具与大众传媒。互联网技术还有多大的潜力？这个问题迄今仍然是一个谜。

每隔一段时间，ChatGPT或者Sora等等新技术产品明星般出场，引起各个群体音量超常的喧哗乃至尖叫。与新型的汽车或者飞机不同，许多人对于这些新技术产品的功能一无所知，以至于技术人员不得不出面担任解说与商业宣传。这种状况表明，互联网技术已经跑到日常需求之前，力图以超前的形式引导大众生活。当然，大众的外行与陌生并未削弱新技术产品的吸金能量。令人咋舌的资金源源不断地向相关领域积聚。那些精明的投资大佬相信技术逻辑的必然延伸：种种前期研究如同排列就绪的多米诺骨牌，一个节点的开启将带动诸多后续环节的成功。技术与模式的深刻改变。铁路运输哪些货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铁路构造出新型的城市、新型的工作与新型的困倦。几个世纪以来，大众传媒正在精神领域产生相似的效果。大众传媒的传播范围、传播速度本身即是一种文化内容。大众传媒的历史当然可以追溯到印刷文化的平装书与报纸杂志。平装书或者报纸杂志不仅提供长篇小说与日常新闻，而且打开了大众的阅读空间，重新划分各种文化层面。广播与电视可以视为电子传媒的代表：广播组织起一个声音的社会；电视的影像符号不仅削弱了由来已久的文字中心主义，而且造就一种以家庭为中心的夜生活结构。目前的互联网技术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可以依赖一部手机处理大部分社会事务。作为互联网技术的交汇点，手机的功能包括移动通话、电子邮件、微信或者短信信息，各种型号的视频、图像传播以及各种内容的网络直播；参预经济往来的时候，手机可以网购、传达快递物流信息，可以炒股、付款与收款乃至大额转账；手机可以深度介入社会活动，借助互联网组织各抒己见的公共空间，例如网络会议或者微信群，必要时还可以举行投票选举。总之，这一部随身携带的小机器似乎开始充当某种无形的轴心。

大众传媒的历史表明，技术始终站在大众这一边。遥远的古代社会，文化由少数精英阶层掌控。甲骨、青铜、竹简、石碑等古老的媒体体系只能传递少量符号，文化仅仅流传于一个狭小的圈子；对于圈子外的大众来说，文化如同不可企及的海市蜃楼。进入现代社会，印刷、电视、互联网一次又一次拆除文化的传统门槛，大众兴高采烈地涌入神圣的禁地，营造自己的狂欢节。从卡拉OK、“傻瓜照相机”到短视频的风靡，谁说音乐或者摄影只能由那些自以为是的精英垄断？技术拒绝为文化等级制度效力，大众传媒的意义是开放编码与解码的权限，将这个

权利交到大众手中。相当长一段时间，一批革命家与进步知识分子曾经不遗余力地倡导文化与大众的汇合；出乎意料的是，技术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完成这个使命。

与传统的政治动员不同，技术的很大一部分动力来自资本与商业市场。无论是印刷、电视还是互联网，大众传媒的运行资金获得商业利润的有力支持。经济层面的良性循环返回技术逻辑，并且为技术的未来提供强大的信心与充足的资金储备。这时，大众传媒的“大众”不再是抽象而模糊的群体，而是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大众成员的具体人数转化为企业账本的利润数目。这种状况与一批知识分子的理论预设存在很大差距。他们期待解除精英的文化霸权，协助大众走出精英的遮蔽，“沉默的大多数”是发出自己声音的时候了。这种理论预设包含自我献祭的英勇姿态：精英的文化霸权土崩瓦解的时候，倡导这种主张的知识分子也将混入于大众。尽管如此，许多知识分子并未详细考虑大众的声音寄存于何处。“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口口相传的民间传播可能覆盖多大的范围？大众汇聚在广场上振臂高呼，这种传播显然只是一种象征性原型。大众传媒的出现及时填补了理论预设的空白之处，但是，技术、大众传媒、商业市场的循环关系出其不意地打乱了知识分子的整体构思。

至少在目前，这种循环关系正在带来多方面的不适与震荡。首先，与传统想象划分的文化区域不同，互联网技术似乎超出驯服的工具体裁，试图回鼎若干人文科学的根本问题：在无远弗届的“算法”面前，哲学的“道”或者宗教的彼岸又在何方？音乐、绘画的神奇审美可以化约为另一种“算法”吗？无所不能的芯片或者人工智能仿佛即将接管一切，生命、身体或者精神意识的边界又在哪里？手机依赖症疾速蔓延，那一块电子屏幕会不会成为社交生活乃至家庭亲情无法甩下的牛皮癣？其次，

技术、大众传媒、商业市场的联盟如此强大，一种新型的霸权已经形成。种种迹象表明，商业市场对大众传媒的操控成为干扰乃至干预作品内容的重大因素。书籍印数、电视收视率或者网站的流量几乎充当衡量作品的首要标准。第三，许多时候，真实的大众与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理想形象存在差距。大众并未对大众传媒的霸权表示反感，相反，他们欣然接受定制的各种套餐，内心充满一个消费者的快乐与自豪。网络空间的欺世盗名、众口铄金、盲从偏执、轻率暴戾比比皆是，并且装饰为耸人听闻的娱乐的形式。知识分子发现，娱乐主题的感召力远远超出预计；沉湎于娱乐的大众如此陌生，以至于无法熨帖地安放在他们设计的未来蓝图之中。

一些知识分子流露出不可掩饰的失望，甚至抱怨大众传媒是一段文化的弯路。的确，没有理由否认失望与抱怨背后的事实。但是，另一些事实表明，乐观的可能仍然存在。绕开显眼的娱乐主题，技术与大众传媒仍然显示出处理生活乃至重塑生活的多种可能。许多知识分子正在专业领域分享先进技术，只不过将各种收益视为理所当然。更大范围内，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与一批报纸杂志分不开。尽管那个时期的报纸杂志曾经是武侠小说或者鸳鸯蝴蝶派的温床，然而，历史还是摆正了方向：大众传媒为鲁迅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提供了破门而出的空间。这个范例引申出的观念是，进步并不是技术的天然产物。

各种纷杂的因素交错互动，技术始终是一柄双刃剑。技术使用的复杂程度不亚于技术的发明，涉及各种衡量、评估与争取什么、禁忌什么。互联网技术的前景如此广阔，以至于不得不追问：历史需要什么？只有正确解读历史罗列的清单，技术的正面意义才能真正解放出来。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
[QR Code]